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

(专辑·续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

彭承进 张道庆 陈建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овый мир》 1983, № 1.

本书根据苏联《新世界》杂志 1983 年第 1 期译出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

专辑·续编

彭承进 张道庆 陈建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25 字数 82,000

1986 年 4 月第 1 版 198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3188·64 定价: 0.85 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一书原收五篇文章：《小地》、《复兴》、《荒地》、《按工厂的汽笛生活》和《祖国之情》。上海译文出版社已于一九八二年翻译出版了专辑。

一九八三年初，苏联再版了《勃列日涅夫回忆录》，其中增加了三篇文章：《摩尔达维亚的春天》、《宇宙的十月革命》和《论共产党员》。这三篇回忆文章是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发表的。

《摩尔达维亚的春天》主要是勃列日涅夫叙述他战后担任苏联共产党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经过。《宇宙的十月革命》主要回忆他曾经作为苏共中央主管工业的书记，领导建设宇宙火箭发射场并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情况。《论共产党员》主要回忆他在一九三一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的经过，并谈到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其中也涉及对外政策。

苏联《新世界》杂志遵照作者生前的愿望，在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上最先刊登了上述三篇回忆文章。接着《真理报》发表了评论，推崇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有着“丰富的内容”，是一部严肃的“巨著”，具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

义”。

《摩尔达维亚的春天》由彭承进同志翻译,《宇宙的十月革命》由张道庆同志翻译,《论共产党员》由陈建章同志翻译,作为《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专辑·续编)出版。

1984年9月

目 录

摩尔达维亚的春天..... 1

宇宙的十月革命..... 48

论共产党员 100

摩尔达维亚的春天

(一)

在着手撰写新的一章时，我想起，回忆录是在离往事已经很久远的情况下来写的。这就会产生一定的困难：有一些细节和事实已渐渐淡忘和消逝。然而时间长也有一定的好处：回忆仿佛在筛选往事，保留最有代表性和最重要的内容。

五十年代初，我有幸到苏联的摩尔达维亚工作，这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段时期。后来，我又不得不放下已走上正轨的工作，到另一个边疆区去，那里有很多事情需要从头做起。

坦率地说，我总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原来工作岗位的。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有所隐讳：我知道，在一个党的工作者的生涯中，总免不了要调动工作，举家搬迁。党和人民的信任使我欢欣鼓舞，担负起更加复杂的、通常是更重要的工作会使我全力以赴，精神振奋地去执行中央委托的新任务。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赤日炎炎的夏日，我象军人一样，迅速地收拾好行装，动身去摩尔达维亚，可以说是去进行第一次侦察。事前联共(布)中央找我谈话，告诫我

说,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是复杂的:这个边疆区连续两年干旱,尽管我国其他地区照例予以支援,但共和国仍有一些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

那时,摩尔达维亚的形势有些什么特点呢?摩尔达维亚是最年轻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德涅斯特河右岸部分没有同全国一道经历过宏伟的苏维埃建设时期。它应在屈指可数的几年之内走完几个五年甚至几个十年的路程。其他共和国在较长时期内经历过的那些过程,在摩尔达维亚蓬蓬勃勃地展开起来了。德涅斯特河对岸的一些偏僻地区,也要取捷径奔向社会主义。

摩尔达维亚历来是农民的边疆区。农民的心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过来。我知道,农民要同自己的犁、自己的小块土地这些财产分离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说服,也就是必须说服个体农民相信集体经营的优越性,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表明,对于摩尔达维亚许许多多农民来说,劳动社会化的新形式最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

对我来说,时间好象在倒转:在我有幸工作过的俄罗斯农村中,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中早已解决了的任务,又重新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就是说,不得不象在共青团员时期那样,鼓动建立集体农庄,加快工业化速度,加强工人阶级的作用,关心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成长。

我记得,一九五〇年六月底,联共(布)中央把我召去,谈了所有这一切。他们对我说,中央认为,摩尔达维亚党组织目前需要一个能够以新眼光看待那里困难局面的人。

关于这一点很快就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全会上讨论了。全会推荐我担任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组织领导人的职务。这次全会的速记记录至今还保存着，党的档案馆工作人员不久前把这份记录送给了我。我兴致勃勃地看了一遍。这份文件就其本身来说是有教益的。当时在全会上宣读了中央的建议，其中说到，“勃列日涅夫同志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党龄、年富力强的同志。他当过土地规划员和冶金工作者，熟悉工业和农业。他多年来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就是一个明证。他是个经验丰富、有毅力而且孜孜不倦的人，经历过战争的全过程，拥有将军军衔，处事果断……”

我要说，关于果断，我有自己的看法，从那时到现在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在党的工作中，以及其他任何工作中，我从不力图发号施令。我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遗憾的是，在我的实践中往往会碰到这样一些领导人，他们不深入研究事实和现象的本质，只看表面，就象俗话所说的，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急于发号施令，作指示，下组织结论。这是有魄力的表现吗？不，我不这样认为。

有一些人就是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的癖好，正如经验所表明的，他们喜欢的不是深思熟虑的分析，而是匆忙地作出决定，凭一时的感情行事，而且更糟糕的是出于个人自尊心行事。于是便发生强迫播种、提前收割、项目未竣工就急于交付使用、虚报成绩……

我们党内早就坚决谴责发号施令。我向来反对发号施令的做法。至今我仍认为必须坚持不懈地和目的明确地使干部在任何岗位上，在利用权力方面毫无例外地养

成坚持党性的习惯。

军队工作的经验，首先是前线工作的经验使我把对人们的义务、纪律性和对所托付工作的责任感，看得高于一切。在我看来，不这样做，任何组织都毫无意义。形势越复杂（摩尔达维亚的形势的确复杂），就越需要这些品质。我们共产党人是从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原理出发的，即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而且应该经过讨论和斟酌。但一经集体作出决定，就应该无条件地执行。为此需要有效的监督。任何人都必须对党委托他完成的任务负责。而这一切，我宁肯称作制度、纪律，而不是一些人喜欢称作的那种果断。

（二）

到了摩尔达维亚之后，我不是在首都坐等召开全会，而是立即到各区走走——想亲眼看看我只是从文件上了解到的这个边疆区的情况，想同人们谈谈，了解人们关心什么，对我们这些党的领导人有什么期望。在多年的党的工作中，我已养成首先从劳动集体、党组织方面了解情况的习惯。如果目光敏锐，什么事都可一目了然，心中有数。

有一次就是这样的。我们去奇米什利亚区委会。顺便去看看区委书记。我们相互作了自我介绍。

“阿夫捷纽克，格尔曼·特罗菲莫维奇。”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中央代表。”

我见他不是热情相待。

“怎么，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怎么说好呢……从基什尼奥夫来了五个人。他们如天外来客，老是缠着你。正忙着抢收，大片大片的庄稼，可他们却有时间——要我们准备向中央局写报告。又要给他们报表，又要陪着他们到处转，……您也是为这种事来的吗？”

他对不适时机的来客的不满是那么率直，使得我们俩都笑了起来。

“不是那回事，”我对他说，“我是从莫斯科来的。想了解一下共和国的情况。”

“那就没啥……也许您还能帮助我们呢。”

“你们有什么发愁的事吗？”

“眼下发愁的是联合收割机，当然，还有联合收割机手。这要到哪儿去找呢？没有人教他们。青年人多的是。”

“好，我们到地里转转……”

在“马克思”集体农庄，我们看了一大片小麦。种在山丘上，地势起伏不平。庄稼长得正如人意。远处，有一台联合收割机在发出轧轧的响声。道旁放着丢在一边的堆垛机。走近一看，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在干活。原来，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台机器来收割。

“你怎么把堆垛机卸下来了？还是机器坏了？”

“没有坏，根本就不好使！堆垛机比联合收割机本身还重，真是麻烦透啦。可这个地方又是山丘，拖不动，就是这么回事。连水箱的水都开了。机器一使唤就坏。”

我看了看这个小伙子——他完全没有过错！他是爱

护机器的，看得出来，他非常努力；他收割过的麦茬，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我记得，当时我坐到小伙子身边，在笔记本的一页纸上画了一张图：有两条纵向板条，一条钢索，联合收割机手可以在上面调节……我问，你看懂了吗？我看得出，他不仅懂了，而且笑逐颜开……

“真见鬼，我们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呀！其实这做起来相当简单。”

“你就感谢乌克兰的同志吧，”我说，“我是在他们那里见过这种装置的。而对这台卸下来的堆垛机，咒骂也不顶事。它在平坦的地里行驶是正常的。”

过了一些时候，我了解到，乌克兰联合收割机手的发明不仅在这个集体农庄，而且在摩尔达维亚冈峦起伏的其他地区都帮了大忙。

那天，在前线就一直跟着我的司机米沙，米哈伊尔·格奥尔吉耶维奇·福明开着车，带着我和区委书记往前走，在米海洛夫斯卡附近，我们又看到了一台停在地里的联合收割机。我们走到跟前，滑动齿条在移动着。在收割台下面，露出了收割机手的脸。我一瞧，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位姑娘……就在这时，差点发生不幸事故——她转身时，头发被卷到联合收割机的传动装置里去了。她喊了起来，我不假思索，就象一颗子弹似地飞进驾驶室，关掉发动机。终于化险为夷。那个姑娘站了起来，脸色刷白，但仍试图强作笑容。

“喂，感觉怎么样？”

“没事。”

我们一直等到收割机奔向麦田，才向她挥手告别。

“格尔曼·特罗菲莫维奇，”我开腔了，“你们有很好的机械人才。等他们积累起经验来，就会成为高水平的收割机手。”

“是啊，小伙子们是挺不错的，只是让他们撂下了农活。每个人都要经区委会考核，这需要时间，而我们这儿在地里都是在争分夺秒。”

“这件事我们就这样说定啦：我们不会取消考核这一手续，但要这样来办——不是让他们去区委会找你们，而是让区委会的工作人员到地里去找他们。”

这次去基什尼奥夫是我第一次下去视察工作。回来后，我立即打电话给当时的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尼·格·科瓦利，在收割大忙时节，你们去搞检查，搞报表，要人撂下农活，这样做对吗？在这种时候要节省时间。

那一次在各区视察期间，也碰到其他一些事情。在德涅斯特河右岸的农村，情况是严重的。

德涅斯特河右岸的土地与在十月革命后就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德涅斯特河左岸的土地一样，是那么富饶肥沃，同样有密布着果园、森林和小树林，当地称作科德勒高地的山冈，同样有河谷和草原。但是右岸的农村建筑物一点也不好，农舍简陋，屋顶是用芦苇和麦秸铺成的。人们光着脚，衣衫褴褛，补钉纳补钉。而主要的是，我上面已经提到，土地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无论你往哪里看，耕地交错，阡陌纵横。

后来我确信，摩尔达维亚拥有最良好的条件，可以成

为国家的一个谷仓。土壤肥沃(这里的人说：棍子插在土里也能开花结果)、阳光充足、农民勤劳。但是，干旱、土地长期缺水历来是这些地方真正的灾难。接连两年歉收，使终于分得土地的人们心灰意冷。在右岸存在个体经济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抗旱——这里用最原始的方法找水、蓄水。我真没有想到，我会看到这种景象。

老年人告诉我，战后头几年虽然发生干旱和饥荒，比萨拉比亚的农民仍然忘我地劳动。当时有些人已筋疲力尽，手里握着犁把或镰刀就倒在垄沟里。严峻的考验并没有摧垮人民。德涅斯特河畔出现了首批集体农庄。国家及时予以大力支援，满载着机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建筑材料、谷物和肉类的火车日夜开来，而当时的产量暂时还是很低的。必须在短期内，从开发共和国经济的大量投资中获得收益——任务就这样明摆着。

一九五〇年七月，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举行中央全会，讨论联共(布)中央关于摩尔达维亚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的决议。这是我在摩尔达维亚参加的第一次全会。

应该指出，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直截了当地按照党的原则，尖锐地谈到了中央局。我记得卡缅斯克区委书记 H·E·加蓬诺夫的一次发言。他在发言中举了这样一个事例：最近半年，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给区委会发出了一百五十九个各式各样的决议，而连续三年却未派出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到区里来。记得在休息时，我走到他跟前说：

“挖得很深，加蓬诺夫同志，好样的！”

可他回答说：

“我说出了大家头痛的事……可是有些人跑来劝我说，你把速记记录涂掉吧。事实确实如此，但可别让人家记仇呀！”

得给他鼓鼓劲，我就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就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是不会让人受委屈的。于是我想起了批评开展不起来的问题，这不又是一个例子吗？——看来有些干部已从反面吸取了教训。

不过，我应当给我的前任尼·格·科瓦利以应有的评价。他在发言中作了充分的自我批评，正视自己的错误和中央局的失策之处。总的来讲，我要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做了许多工作，他在最初几年处境确是不容易的。然而，我们党的工作毕竟是这样的性质：在有些阶段，一个人努力肯干，工作做得好，但后来丧失上进心，丧失从党性角度看问题的敏锐性，随波逐流，那末，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必须撤换掉。如果你考虑到事业的利益，关心人民的福利和国家的需要，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至于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科瓦利，他在晚年担任摩尔达维亚计委主席时，工作做得不错，为发展共和国的经济做了很多事情。

(三)

从第一天起就宾客盈门——有来访者，有请求者，有汇报者。有些问题在许多方面关系到本地区的前途及其在兄弟共和国大家庭中的作用和地位、共和国劳动者的福利，必须经常研究加以解决。

农业在当时是最吃重的突击战线。从数字看，集体化的进程是顺利的。但是，即使在听到共和国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的汇报时，我也没有在那天匆忙下结论。成绩当然不小，但还有一些区，甚至有一半的农民都未加入劳动组合，再说已建立的集体农庄怎么说也不能认为是健全和巩固的。

那时，我常常去参加一些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作出建立集体经济的决议。我正要经常阅读关于决议执行情况报告。摩尔达维亚的大多数农民并不怀疑这种对他们来说是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的好处。然而，我知道，空话不能使他们信服。人们想亲眼看看集体农庄是什么样子。简单地对他们说：快点把各人的一份土地、牲畜、宅院合并起来，那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些组织良好的集体农庄作为示范，使农民相信劳动组合是有益的。这种象据点一样的集体农庄，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是培养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的学校。

我记得，我与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П·Т·特卡奇共同组织了我们的首届农业成就展览会。无数生产能手，几十个代表团参观了展览会。这些代表团后来多半都成为未来巩固的劳动组合的核心。

然而，不能不认识到，昨天刚刚申请加入集体农庄的摩尔达维亚农民，不可能立即克服世代根深蒂固的私有心理。农村中，干部力量薄弱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敌对活动也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在活动。他们多半是一步步地进行破坏：始则进行诽谤、挑衅，继而钻进农庄的领导机

构,派进自己的心腹,千方百计破坏农民对集体农庄的信心。他们还使用短统枪,虽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行动,但在集体化过程中仍然有人被暗杀。遇害的有,斯特腊舍内区丘丘连村苏维埃副主席И·П·帕古、兹古里察区兹古里察村农业特派员И·К·普里萨卡里、基什卡连内区门德列希塔村共青团积极分子И·А·博戈诺斯、弗洛烈什特区扎勃卡村妇委会主席М·А·彼斯卡里娅等人。

应当说,在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时,党组织表现出真正的革命警惕性和布尔什维克毫不妥协的精神。

党对集体农庄的领导水平当时确实是一种决定性因素。有一次我去德罗基辅区,在同一个村子的街道上我看到的简直是两个世界。这个村在同一天(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建立了两个集体农庄。一个蒸蒸日上,一个奄奄一息。前一个集体农庄在这些年中购买了二十多台复杂的机器,增加了公有牲畜头数,农庄庄员的现金收入增加了五倍,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后一个集体农庄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产量低了五到六公担,牲畜减少,集体农庄庄员收入微薄。换了几任主席,一切依然如故。

我们开始了解党组织的工作。看到了一些什么呢?在先进的集体农庄,党组织日益增强,富有战斗力,共产党员领导着决定性的生产领域,农庄主席一有什么事,就向他们征求意见。在落后的单位,共产党员无声无息,甚至连会议都不开。农庄主席单枪匹马,孤立无援。整顿了党组织,农庄就走上了正轨。

在一次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上,我引用了瓦连京·奥韦奇金的《致以前线的敬礼》这部小说中我所记